

论新中国反“遏制”的基本经验*

王国学 梅学霞

[摘要] 随着中国迅速崛起步伐的加快,“遏制中国”的论调已经由媒体鼓噪演变成某些国家具体的政治军事战略。其实,“遏制”对于新中国来说并不新鲜,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打到帝修反”口号就是当时中国反“遏制”斗争的一个写照。这个口号并不仅仅是一种宣传,同时也是一项重大的国际战略。它既是毛泽东对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改变的一种期待,又是毛泽东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一项战略之举,其具体的贯彻措施包括政府声明、民众动员、对外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国内军事战略部署调整等多个方面。评价这一战略,我们既要看到其“左”的倾向,也不能忽视它客观上所具有的务实效果。

[关键词] 毛泽东;国际战略;“帝修反”;反遏制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1)05-0057-05

2011年4月10日,中国经济网一篇《外媒称日美印将提高对话机制以遏制中国》的报道援引多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日本、美国和印度三国已经达成协议,将于本年内建成讨论安全问题等区域局势的新的高官级对话框架。这个机制的主要议题是分析和应对在军事和经济领域迅速崛起的中国的动向。这则消息引起中国媒体的广泛关注。人们不禁猜测,三国协议达成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遏制中国崛起的政策会不会更加具体?中国能否制订出有效的反“遏制”措施?

其实,“遏制”对于新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对新生的“共产党中国”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敌视政策。新中国就是在不断打破西方国家层层封锁的斗争中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确立大国地位的。在反“遏制”的斗争实践中,中国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打倒帝修反”口号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东风压倒西风”,认为“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紧张局势“归根结底对帝国主义更不利”,“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更有利一些”。^{[1]pp.384-388}正是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在进入60年代后,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以及中印在西藏问题上矛盾的升

级,毛泽东断定“帝修反”已经掀起了反华大合唱。为应对这种局面,毛泽东确立了一条“两条线”国际战略,提出了“打倒帝修反”口号。本文拟以分析此口号为例,尝试进行新中国反“遏制”斗争的基本经验研究。

一、“帝”“修”“反”在毛泽东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含义

众所周知,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政治术语,“帝修反”指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国家和以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为代表的反华仇华国家。这些国家是当时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斗争对象。但是,“帝修反”的这种特定含义有一个形成过程。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当作同义语来使用,其对立立面是“革命派”或“人民”。例如,1946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既使用“美国帝国主义”又使用“美国反动派”,^{[2]pp.1191,1195}两种表述,一个意思。再如1949年毛泽东说:“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3]p.94}显然,这里所说的“外反动派”就是帝国主义,“内反动派”就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更倾向于

* 本文系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10D081]、黑龙江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意识形态冲突与意识形态建设”[HEURS09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王国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大学德育与青年心理研究中心副教授;梅学霞,哈尔滨工程大学大学德育与青年心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用“反动派”一词指称除了帝国主义之外的敌对势力，并在前面加上限定词，使之指代一个特定的对象。如1950年6月6日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毛泽东多次使用“国民党反动派”一词，并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两词并列起来。从行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有意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区别开来，以便达到突出帝国主义的效果。如果把1958年12月毛泽东关于纸老虎的论述同1946年他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作对比，就会发现毛泽东明显有要突出帝国主义的意图。他在1946年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并列举沙皇、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的事例来说明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也必将被打倒。显然，那时候毛泽东是把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都作为“反动派”来看待的。1958年12月毛泽东所写文章的标题就是《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显示出毛泽东有意把帝国主义突出出来，意思是帝国主义不是一般的反动派，而是更强大和危险的敌人，以至于再用“反动派”一词称呼它已经不够准确了。如果帝国主义仅仅是反动派之一，即“反动派”包含了“帝国主义”，则显然“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这样的表述犯了属种并列的逻辑错误，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反动派”。但是，以毛泽东深厚的文字功底和一贯严谨的文风来判断，他是不会出现这样的笔误的。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的开幕词中得到验证。在开幕词中，毛泽东使用了“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内外反动派”等表述，并没有使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这样的说法。^[4]由此可以肯定，最迟到1958年12月，在毛泽东那里，“反动派”一词已经不再包含帝国主义，而开始转为专指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一类敌对势力了。这一推论还可以从毛泽东自己的一段话中得到进一步证实，他在1958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按语中写道：“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一方，各国人民为另一方，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并没有解决。”^{[11](p.481)}很明显，这句话中的“走狗”与上文的“一切反动派”是对应的，两者虽称谓不同，但意思一样。

另外，这一推论也可以从后来毛泽东的一些表述中得到证实。例如，1959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15](p.247)}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分开来表述。在同年12月的杭州政

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在讲话提纲中写道：“1959年，在三月至今，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5](p.600)}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一则批示中也写道：“所谓大反华……不过是西方国家的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6](p.93)}在同年6月15日的一则批语中，也有“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者和半修正主义者”的表述。^{[6](p.210)}1961年，毛泽东在对何其芳写的《〈不怕鬼的故事〉序》作修改时也有多次类似“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这样的表述。^{[7](pp.128-143)}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反动派”一词外，毛泽东还使用“走狗”、“反动同盟军”、“代理人”、“仆从”等词来指代帝国主义的追随者。^①而对于美国扶植下的日本、西德当局，毛泽东则有时候称它们为“军国主义”。

至于现代修正主义具体指哪些国家，也有一个变化过程。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所批判的现代修正主义主要指南斯拉夫。进入60年代，中国开始把苏联视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毛泽东最早认定苏联为修正主义的时间应该是在1960年7、8月份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与胡志明谈话时称赫鲁晓夫现在是修正主义的代表。^{[8](p.346)}“修”除了指代南斯拉夫、苏联外，也包括苏联的追随者波兰、东德、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蒙古等，因此就有了“苏修”、“捷修”、“蒙修”等词的出现。^②

用“帝修反”来分别指代不同的敌对势力，反映出毛泽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一贯工作作风和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工作方法。但同时也必须承认，“打倒帝修反”口号的广泛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我国一贯倡导的“求同存异”的对外工作方针造成了冲击，助长了外交工作中的“左”的倾向，使得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一度出现了不应有的全面紧张局面。

二、贯彻“打倒帝修反”战略思想的主要路径

在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29条口号中，第16条是：“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③在政治运动的每一发展阶段或每一重大事变中提出动员口号，是毛泽东倡导的实现政治领导的一个重要方法。^{[9](p.262)}口号指明了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而与确定目标同等重要的是选择实现目标的措施。就实现“打倒帝修反”的目

①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192、223、237、271、301等页。

② 参见《人民日报》1967年5月27日第2版。

③ 参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人民日报》1969年9月17日第1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标而言,其具体的实施路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发表公开声明,召开群众集会,营造浓厚的政治氛围。每当“帝修反”制造危害中国利益或其他被压迫民族利益事端的时候,毛泽东就以政府的名义,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发表公开声明,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必要时还在北京等大城市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这是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反对“帝修反”的一种主要政治手段。在1964年“北部湾事件”、1967第三次中东战争、1969年中苏珍宝岛军事冲突等重大事件中,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群众涌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这种活动有两个作用:一是向世界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同时显示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支持中国政府反对“帝修反”的坚定意志;二是进行精神准备,在全社会营造出一种和“帝修反”斗争到底的政治气氛,提高国家的软实力,激发出民众参与政治斗争的热情和勇气。

第二,开展大规模的对外援助,以实际行动支援世界人民反对“帝修反”的斗争。除了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声援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外,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还向处在反帝第一线的国家提供大量无偿援助,如人员培训、物资资助、武器供应等。他的一贯立场是:“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10]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对外援助就已开始了。据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7年底,中国对外援助的金额达到近21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占95%。^{[11]p.96}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抗美物资、武器装备、现汇等折合当时的美元至少在200亿以上。^{[12]p.92}除越南外,1961年至1969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约15.4亿元人民币的无偿军事援助、15.5亿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以及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13]pp.343-346}中国对外援助坚持“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等八项原则。^{[14]pp.388-389}这八项原则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来的。^{[15]p.319}它一方面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无私援助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毛泽东有意通过国际援助来增强广大亚非拉地区人民反对美英法等国的斗争决心和能力,减少苏联对这些地区的政治影响,树立了中国作为无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形象,使“第一中间地带”成为中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战略依托。

第三,有针对性地调整国防战略,从最坏处着想来部署军事力量和安排经济建设,做好备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军事战略重点一直是在东部和东南沿海一带,主要针对美国和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军队的可能反攻。那时候中国的战略对手是“帝”和“反”——美国 and 台湾国民党当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又开始在东北中朝边境布防。50年代后期,

随着中印两国在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升级,中国又加强了在西南边境的军事部署。进入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开始对中国的战略防御进行调整,把“帝”和“修”的威胁都考虑了进来。1964年5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16]p.778}同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因此毛泽东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他尤其强调三线钢铁基地的建设,指出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并说,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17]pp.1199-1200}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当时备战工作的重视程度。三线建设既着眼于帝国主义国家突然袭击,又着眼于修正主义国家大举入侵,还考虑到各国反动派的进攻。1964年周恩来在解释“三线”地区划分时说:“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对东南亚来说,南边几省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18]p.1597}

第四,在军事动员和军事训练方面做好充分准备。早在1958年9月召开的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枝,将来要发几千万枝。由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19]p.347}1962年,全军各部队开展了整编备战工作,民兵工作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展了“三落实”活动,即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1964年,全军举行了大比武活动,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军事训练。1970年冬,全军还开展了一次长途野营拉练,通过练走、练打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1969年珍宝岛战斗后,中国军队训练重点转向对付苏联军队的进攻。从1972年开始,中央军委要求“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部队从单兵到分队,从步兵、炮兵、装甲兵到航空兵都积极开展了打坦克训练。^{[19]p.54}

三、关于“打倒帝修反”战略实施效果的总体评价

如果单单从字面上来理解,“打倒帝修反”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时至今日,美国的全球战略并没有多少改变,依然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苏联的“修正主义”不但被坚持下去,而且苏联解体后的全部加盟共和国在政治上都实行了多党选举制,在经济上实行了私有化,从修正主义径直走向了资本主义。“美帝”、“苏修”都没

有被打倒，“各国反动派”也都没有被推翻。同以前曾经提出的口号如“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相比，“打倒帝修反”似乎仅仅是一时的宣传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字面上而是从提出这个口号的国际背景来分析，就会发现，“打倒帝修反”既是一个口号，也是一项战略。作为战略，其目标有两个：第一，维护国家安全、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美国早在国共内战中就和中国共产党结下积怨，在朝鲜战争中两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在越南战争中又进行政治、军事较量，加上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美国事实上把自己摆到了中国的敌对位置上，严重威胁到中国国家安全。另外，在国际社会上美国带头孤立中国，向其盟国施加压力使它们不敢承认新中国，阻挠新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在国际贸易中搞对华禁运。这些事实说明，美帝国主义是新中国政权的主要危险源。联系到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在1918年对俄国革命的干涉，以及1941年希特勒德国对苏联的入侵，毛泽东对美国的防范并非杞人忧天，毫无根据。苏联在进入60年代后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与中国发生严重分歧，而且还作出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不义之举，并在新疆策划中国边民出逃国境的“伊塔事件”。由苏联方面挑起的中苏边境事件从1960年至1964年9月共计1674起，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又增至4189起。^{[20] (p.356)} 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和铁列克提之战把两国的军事冲突推向了顶峰。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的事实使中国更加切实地感受到，“修正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国家的主要威胁。另外，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插手中国西藏事务，蚕食中国边境领土，也直接损害了中国国家权益。上述事实说明，打倒“帝修反”并非仅仅是一个宣传意识形态的口号，而是中国对于国家安全局势面临危险所作出的主动应对。

在谋求实现维护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时，毛泽东对“帝修反”并非平均用力，而是有轻重缓急之分的。60年代前期，毛泽东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是首要的，所以仍然延续50年代的对美政治斗争和军事对抗战略。进入60年代中期，毛泽东开始警觉苏联的威胁并在军事战略部署上作出调整，在编制“三五计划”时作了战备安排，进行了大规模的大小三线建设，战略部署既针对美国，也防备苏联。6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受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在中共九大上，中国宣布“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但同时，中国又向美国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21] (p.68)}

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里，军事上只能重点对付一

个主要敌人。1972年1月，在讨论《中美联合公报草案》的时候，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当然写进去也不好！”^{[22] (p.79)}从60年代末开始，“三北”地区已取代华东和华南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对苏防卫战已成为中国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19] (p.53)}后来毛泽东总结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23] (p.15)}

至于对“反动派”的斗争，中国仅仅在1962年和印度打了一仗，此外并没有和其他反华势力发生武装冲突（1974年西沙之战除外）。这说明在毛泽东的战略考量中“美帝”“苏修”是重点，所以人们常用“两条线”来概括60年代中国的对外战略，而“反”则被忽略了。

“打倒帝修反”作为战略的第二个目标是推进世界革命。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热衷于和美国搞合作，背弃了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原则，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旨，已经不能担当起领导世界革命的历史任务。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变修之后，理应承担起推进世界革命的重任。毛泽东在六七十年代大力援助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不能说没有这种考虑。更为重要的是，亚非拉国家的反帝反殖斗争也能够牵制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这样就在战略上配合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斗争。

总之，在追求第一个战略目标的时候，毛泽东秉承务实外交的理念，对于“帝修反”均采取政治上攻势、军事上守势的策略。即便是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也是中国在政治谈判无果的情况下对印度军事挑衅的回击，且并没有以军事上的胜利为资本迫使印度订立城下之盟，而是主动撤出双方有争议的区域，体现出协商解决领土争端的诚意。另外，中国的备战工作也只是立足于防御外敌入侵，没有主动进攻的意图。至于当时的备战工作是否过了头，毛泽东是否夸大了战争爆发的危险，从我们现在事后诸葛的角度看似乎是有那么一点。不过按照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来看似乎更有道理。他在1965年4月底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24] (p.1347)}

[参考文献]

-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 [4] 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毛主席开幕词.人民日报[N],1949-9-22.

-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7] 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8]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 [9]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毛主席接见非洲朋友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N],1963-8-9.
- [11] 贺耀敏,武力.五十年国事纪要(经济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 [12] 邓礼峰.援越抗美述略[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1)
- [13]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 [14] 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 [15] 吕正操.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背景[A].新中国外交大意义[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 [16]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 [1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 [18] 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19] 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J].党的文献,2002,(4).
- [20]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
- [21] 李丹慧.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J].党的文献,2002,(3).
- [22]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 [23] 宫力.关于60年代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0,(4).
- [24]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美 景

(上接第16页)

- [14] 解松.当前主要社会思潮及其影响[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9,(2).
- [15] 刘同舫.在应对当代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威力[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3).
- [16] 刘京生.当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J].理论前沿,1999,(19).
- [17] 王建光.当代社会思潮及其对中国的挑战[J].探索与争鸣,2004,(10).
- [18] 梅荣政,王炳权.论社会思潮总体性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2005,(19).
- [19] 文雅.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引领和整合——兼论我国社会思潮的特质[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 [20] 魏红霞.当代社会思潮的新特点及其对大学生的影响[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4).
- [21] 朱士群.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回应与引领[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4).
- [22] 余双好.当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的特点与应对方法[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11).
- [23] 邱柏生等.试论当代社会思潮影响的内在方式[J].思想理论教育,2010,(7).
- [24] 陶文昭.互联网的社会思潮[J].电子政务,2010,(4).
- [25] 梅荣政,王炳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6).
- [26] 胡振平.当今中国意识形态的引领和包容[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10).
- [27] 廖胜刚,秦在东.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战略思考[J].广西社会科学,2008,(8).
- [28] 刘长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三大机制[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9,(3).
- [29] 王永贵等.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0.
- [30] 敖带芽.论“引领”[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2).
- [31] 赵勇,陈锡喜.开放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选择[J].学术论坛,2007,(3).
- [32] 张国祚.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J].求是,2006,(10).
- [33] 韩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N].光明日报,2009-5-26.
- [34] 石本惠.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及其整合的功能[J].社会主义研究,2006,(6).
- [35] 王国敏,李玉峰.挑战与回应: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地位[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11).
- [36] 吕世荣,周宏.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指导[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2).
- [37] 陈秉公.论国家意识形态“高势能”建设与实现“引领”功能的基本方式[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5).

责任编辑:云 尔

Deng Xiaoping's Reading Year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s a great Marxist, Deng Xiaoping placed much emphasis on reading and he was good at reading. We may say, his life had been spent in reading and practice. His reading year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reading years in Guang'an, in Europe and in Jiangxi. His reading time had been unique and thought provoking, characterizing integration of the ancient and the present, foreign and Chinese, seeking to the end and pursuing truth, reading for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others. From his reading experience, we can obtain profound historical insight, that is, we should stick to the integration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lifelong self-study, reading the real books and the social "book", and learning national excellent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 (LIU Jian-wu)

90 Years' Exploration of the CPC Permanent Tenure System and Experience Summa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gan to implement the system of representative congres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tarting to explore the permanent tenure system.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explicitly proposed this system and carried out initial practic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re have been two high tides for practicing this system.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the permanent tenure system had some profound reasons. The reform of the permanent tenure system should be based on China's situation and can never imitate that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e reform, a complex systematic project, cannot be done once and for all and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positive steadiness and firm effectiveness". (YAN Jie-feng TANG Yi-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CPC Anti-Japanese and Democratic Governmen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Its Revelation: In the long-term revolutionary struggle of the democratic government led by the CPC in the Anti-Japanese revolutionary bases, a full set of legal systems in people's jury, judgment, mediation and others had been established, which condensed the experiences and wisdom of the legal work led by the party and provided important revelation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and laws of people's legality and active judicature: first,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s the essential guarante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second, judicature for the people embodies the systematic nature of people's justice; active judicature is the necessary requirement of the justice for the people. (LUAN Shuang PING Xu)

On the Basic Experiences of New China's Anti-containment: With the fast rise of China, "containing China" has changed into the specif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S, Japan, India and others from a cry in media. In fact, it is not new for China. In the 1970s, the slogan "cracking down imperialism, revisionism and anti-revolutionary" a reflection of the struggle of "anti-containment" was not only a kind of propaganda, but also a major international strategy. It was both Mao Zedong's expectation toward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a strategic move to deal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specific measures include governmental announcements, people's motivation, military and economic aids to foreign countries and many other aspects. In assessing this strategy, we should not ignore the practical effect while noticing the "leftist" tendency. (WANG Guo-xue MEI Xue-xia)

Tentative Analysis of Lenin's Proletarian Cultural Theory: Lenin's theory of proletarian culture represents itself in the form of a paradox: against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with the strong existence of national countries and their cultures, stick to the position of the proletarian culture, uncover the camouflage of the nationality and uncompromisingly struggle against nationalism; as to the appeal of the so-called "pure proletarian culture", it will be negated with the absorption of all cultures including capitalist culture. Against the expanded theoretic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cultural thoughts of Trotsky and Bukharin, maintaining that their points supported Lenin's theory about proletarian culture, which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restructuring of Marxist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HUANG Li-zhi)

On the Theoretical Features of Lenin's Though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 Reading Notes of The Thematic Collection of Lenin: In the process of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of leading the Soviet people, Lenin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arxism. Lenin's though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has striking theoretical features: to integrate revolutionary theme and the construction theme and place high emphasis on social construction; to integrate the party's leadership with the mass mobilization and fully exert the role of people's group; to integrate the pursuit of equality and the elimination of social difference to realize the democracy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to integrate the welfare warranty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take communism as the ultimate goal of social construction. (ZHANG Yun-fei)

Clarifying the Essential Intension of Several Popular Word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ccording to Marxist point of view, language was the product of the human being in the thousands of years in their labor and lives. Language, as a communicative tool, serves all kinds of social ideology, all kinds of social system, various classes and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ll kinds of concepts in the western discourses should be borrowed and adopted for us to use. In different discourse system, there contain different natural meanings. I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we must place emphasis on establishing a discourse system independent of the western world so as to mainta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ights of our country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just and reasonable new or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 Shen-ming)